

# “抗日战争与大后方建设” 学术讨论会综述\*

温 艳

为进一步深化对抗战时期历史的研究,特别是交流大后方建设的学术成果,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及中国现代史学会主办的“抗日战争与大后方建设”学术讨论会于2014年11月7—11日在西安举行。会议共收到论文58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南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山西大学、兰州大学、河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以及贵州、河北、陕西等省社会科学院的70余名学者参加了会议。

**一、中共领导的根据地** 中共领导的根据地是抗战史中经久不衰的研究课题。近几年,在“新革命史”研究范式的影响下,学术界对根据地史的研究得到拓展与深化。抗战时期的中共简政是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有机结合,这也是中共简政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的把增强认为,华北抗日根据地中共简政实践中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全面紧缩,并主要从紧缩行政区划、行政机构和脱产人员等方面对华北抗日根据地中共的简政政策进行了研究。厦门大学王明前从“三三制”的贯彻、险恶斗争环境下特殊的政权形式——“两面派”政权、村政权的改造三个方面考察了晋冀鲁豫边区的政权建设。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耿磊认为,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及陕甘宁边区政府注重民间传统互助对民众集体生产的刺激性,有效地将民间传统与江西苏区互助衔接起来,强调二者在劳动力调剂方面的同质性。

近年来学界对根据地的廉政建设关注较多,但是对根据地的基层干部待遇问题少有关注,山西大学岳谦厚、宋儒提交的论文弥补了这一不足。文章认为,边区基层干部队伍一方面从制度上主张他们享受低标准待遇,日常生活处于社会较低层次;另一方面则在具体实践中又有人常常利用管理漏洞和职权便利攫取“灰色收入”,有意无意地侵害着普通民众的利益。

根据地的法制建设是本次会议讨论比较多的话题。中共中央党校的高中华认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陕甘宁边区领导的劳动保障工作,经历了一个从继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的劳动政策,到纠正过“左”的劳动政策、实施正确劳动原则的过程。鲁东大学的杨焕鹏对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司法工作进行了研究,他提出:中共的战时司法工作既脱胎于原国民党政权的司法体系,又针对抗战的具体需求,结合自身的一些具体情形,对原国民党一些司法制度与司法体系等进行了改造与创新。部分与会学者对两篇文章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如陕甘宁边区劳动保障法在多大程度得到了执行?中共在根据地战争动员在多大程度上启用的是司法程序?

\* 本文系第52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基金(2012M521737)、陕西理工学院人才引进基金(SLGQD1333)阶段性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周祖文主要考察了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统一累进税与减租减息问题,他认为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土地政策由没收地主土地改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同时在财政政策上又实行了具有首创意义的统一累进税,从而构成了华北乡村的新的社会与经济背景。

根据地的社会问题也备受关注。河北大学肖红松与兰州商学院胡金野、齐磊均对中共在华北根据地的禁烟禁毒问题进行了探析。肖红松认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烟毒问题与沦陷区的烟毒走私输入有密切的关系,根据地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在查禁烟毒方面取得较大成效。胡金野、齐磊认为中共在华北根据地积极开展反毒化斗争,高度重视禁烟禁毒工作,颁行禁令和指示,查禁烟毒工作取得一定的成效,有效遏制了日本在华北的毒化政策。与会学者就根据地禁毒效果、毒品来源与去向,以及如何回应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陇东学院的温金童认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中医药资源丰富为实施合作医疗提供了物质上的可能。陕甘宁边区的合作医疗,促进了卫生资源的整合,普及了卫生知识,培养了卫生人才,缓解了群众看病难的问题。首都师范大学的韩晓莉以1937—1949年华北根据地、解放区的乡村庙会为对象,考察革命政权改造下,庙会对乡村社会意义的变化,进而以庙会为中介关注中共领导的革命政府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河北师范大学的张志永认为,1941年晋察冀边区进入抗战最困难的时期,晋察冀边区以反正伪军和杂色武装为基础建立了八路军外围军,1944年随着敌后抗战形势的进一步好转,晋察冀边区逐渐改造了外围军。组建外围军是晋察冀边区在抗战环境急剧恶化后的现实选择,虽然外围军存续时间并不长,但它同样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或缺贡献。

除了上述论文外,西北师范大学的李晓英、延安大学的董世超、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的韩伟、西南大学的洪富忠、河南理工大学的米卫娜分别就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过载栈、群众互借运动、文化宪制与民族融合、大后方形象塑造过程中的国共博弈及习仲勋法制思想等问题进行探讨,对深化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有一定的意义。

**二、国统区的政治、军事、经济** 山东师范大学的刘志鹏研究了抗战时期晋、冀、鲁、豫四省的国民党省党部,认为抗战时期随着华北战局趋稳,国民党恢复和重建了战时陷入停顿的华北省党部,国民党省党部组织“先天不足”,在战后的恢复重建中呈现省党部机构羸弱与内部派系分化的弊病,又兼有伴随军政转移的附属性和流动性。西南大学的周勇、周昌文利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以赫尔利(Patrick Hurley)在中国的使命为着眼点,考察了美国政府在二战后期同盟国着手战后安排的背景下的对中国事务,探讨了美国在国共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南开大学的江沛在评论时指出,从重庆谈判及事后国共关系的走向来看,不应夸大赫尔利的影响。

武警工程大学的蒲元认为,抗战期间中国政府和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西南、西北战略后方展开了多项军事合作,为推动韩国独立运动、扩大韩国临时政府国际影响、促进中国国家形象改善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关于大后方金融网的形成及农业贷款。西南大学的刘志英认为,抗战的全面爆发,打破了中国以上海为中心的已有经济金融格局,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国民政府大力推行构建大后方金融网的计划,在这一过程中,中、中、交、农四大国家银行是构建大后方金融网的核心力量。西南大学的张朝晖认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大合作金库的建设进入一个空前快速的发展时期,体现出鲜明的发展轨迹与时代特点,并产生了重大的历史作用与影响。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的许峰重点考察了抗战时期贵州合作金融网的建立及其对农业开发的影响,提出抗战初期农村信用合作社虽然对调剂战时农村经济,帮助部分农民解决生产、生活中出现的困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一般贫苦农民受惠相当有限。陕西师范大学的石涛则从国家与地方的角度考察了抗战时期的陕西农贷。他认为,抗

战时期国家四行二局等金融机构在陕西积极推行农贷业务,构建了一个覆盖全省的农业金融网,并形成了特色农贷模式。但是受战时不利因素的影响,最终未能改变陕西农村的贫困状态。

关于大后方工业建设。西北大学的梁严冰认为抗战前后国民政府的西北工业建设战略,不仅支持了长期抗战,也促进了西北的开发与建设,对西北社会经济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华中师范大学的严鹏重点考察了抗战时期中央机器厂的兴衰,提出在国统区以资委会中央机器厂为代表的企业,在艰难环境中制造了发电成套设备等大型装备,使中国工业技术较战前有了大幅提升。兰州大学的王志通对抗战时期甘肃的煤矿建设进行了个案分析,认为甘肃煤矿建设和开发对战后建设和抗战胜利做出了一定贡献,但因战争而兴的煤矿建设在战后很快便转入衰败。西南大学的杨向昆主要对近年来抗战时期的军事工业研究进行了学术回顾,指出要借鉴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拓展研究的主题与内容、加强资料的整理与出版。

关于国统区的粮食和公粮征购政策。南京大学的黄雪垠从制度史的角度考察了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粮食危机问题。她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粮食危机爆发的根源是国民政府未能贯彻执行囤粮计划,粮政机构不能完全发挥职能,对银行涉粮弊案处置失当,未能及时疏导民众对缺粮的恐慌情绪,从而导致粮价长期持续上涨,终致危机爆发并持续加剧。华南师范大学的洪岚主要对抗战初期广东省地方政府应对抗战的粮食管理政策进行了考察。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汤彦宜的文章指出,1942年实行田赋征实后,与后方各省相比,陕西国统区的纳粮数和人民的平均负担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重庆大轰炸在抗战史研究中,既是军事问题,又涉及大轰炸给重庆社会经济带来的各种变化。西南政法大学的朱海嘉指出,1937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使重庆电力公司获得更大的发展机遇,但随之而来的“惨绝的日机轰炸”给公司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在政府的支持引导下,公司实施了反轰炸措施,使得公司不仅克服了危机,而且扩大了经营规模并促进了陪都社会经济的发展。

建设西北是国民政府建立抗日大后方基地的重要内容,此次会议提交的论文从不同角度讨论了开发西北的问题。兰州大学的杨红伟认为,20世纪30年代,西北地区成为中华民族之国族建构与认同强化的象征性空间。在西北开发思潮中,新疆作为国族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纳入到共同的美好家园之内,而其复杂的族群问题亦成为新疆开发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兰州交通大学的谢亮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主导的西北开发根源于现实困境并折射出国人久存于心的“西北情结”,建设抗战大后方深层次的原因是为了加速推动边疆各族为一体,但“边疆”“民族”观念的局限亦制约了西北开发的实际绩效发挥。四川师范大学的汪洪亮则以《边政公论》为考察对象,探讨了20世纪40年代国人对边疆经济发展的地理基础及其开发路径的相关认识。

**三、灾荒、会党、医疗、文化、人物等问题** 随着电影《1942》上映,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江沛提出,因史料限制,以往对该事件的研究并不充分,其中有关灾荒的真实状况、国民政府的救灾行动、灾民的死亡人数及中外舆论界的灾情报道等,均有再探讨的重要价值。他认为对待此次灾荒,从国民政府到蒋介石并不是无情与冰冷而是有相应的应对措施。对于此次旱灾中死亡灾民的人数,他认为30万比较接近真实,而不是长期流行的300万。四川师范大学的曹成建讨论了哥老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查禁哥老会而又缺乏效果的情况下,一度在暗中利用哥老会来抗日,却反被哥老会利用,以合法化的名义来壮大自身声势,与政府的初衷背道而驰。正是因为政府对哥老会态度上的举棋不定,严重影响了查禁效果。吉林师范大学的范立君探讨了抗战时期的重庆失业问题。他认为抗战时期,身为国民政府陪都的重庆,因城市轻重工业发展失衡、难民大量涌入及自然灾害频发等因素,使失业人数大幅增加。庞大的失业人群既促进又阻碍了抗战的进行,使城市社会秩序变得更为动荡,不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西北大学的

胡勇通过考察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西北大后方的卫生建设,认为第一,近代卫生行政体系的建立并非易事,需要进行长期、大量的艰巨工作;第二,需要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社会的关系;第三,需要重视卫生在开发巩固边疆中的作用和存在的问题。

关注大后方文化方面的论文,主要集中在文学,民众教育,高校、科研院所内迁等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李仲明主要考察了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学艺术创作。他认为,随着抗战初期文学界名家内迁西南,加上当地原有的文学创作队伍,大后方的文学创作繁盛一时,为抗战文学乃至整个现代文学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为抗日救亡贡献了力量。扬州大学的朱煜考察了抗战大后方四川和重庆的民众教育馆,认为抗战期间民众教育馆以抗敌宣传、实施民众训练、发动后方服务作为工作的中心,其宣教活动为抗战建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长安大学的杨博以西安事变的事发地华清池景区的建设变化为对象,探讨了“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塑造问题,认为通过淡化景区所蕴含的民间信仰,增强对领袖的尊崇和国家民族意识,客观上起到了激励民众抗战热情和促进民族复兴文化建设的作用。抗战时期西安的复兴成为政府和民间关注的焦点,陕西师范大学的侯亚伟重点考察了中外旅行者对西安的认知。华东师范大学的韩成以大夏大学申请“国立”的历程为个案,考察了政学关系。他提出,通过大夏大学“国立化”风波一事,可以对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性质进行反思。

西南大学的高佳、潘洵、赵淑婷分别考察了抗战时期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与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内迁,以及其对中国科学事业做出的贡献。他们指出,战时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和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内迁,保存了中国现代科学研究的火种,对于促进西南地区矿产资源的开发、支援战时国家工业建设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对抗战人物的讨论也是此次会议中较有特色的部分。陕西师范大学的张华腾主要考察了宋庆龄对两个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西南大学的赵国壮探析了经济学博士张晓梅在西南地区的社会经济调查活动对今天开展民国时期西南地区社会经济研究的贡献。中山大学的李欣荣通过对粤籍史学家张荫麟的论政、参政活动的考察,分析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参政问题。他认为在抗战的大背景下,中共的左翼人士虽能为政府所用,却又无法大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吴敏超主要考察了印尼华侨黄氏家族投资的中国酒精厂,揭示华侨投资背后的人脉关系,有利于凸显以往经济史研究中隐而不彰的个人因素,认为其创办、发展与衰败的过程,不仅与抗战前后的政治经济形势密切相关,更与国民政府政要朱家骅与黄氏家族的长期交谊息息相关。

**四、抗战史研究的现状及其研究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荣维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抗战史研究的历程进行了回顾。他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抗战史研究的内容与视角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学者摆脱抗战史研究的“革命范式”,更多的关注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并提出抗战史研究“扎稳根基,搞清基本史实;寻找基本的规律;形成科学历史观”的三步论。他提出了抗战研究中最亟待解决的两个问题:一是碎片化倾向;二是我们不能将民族感情带到研究中去。长治学院的段建宏从考察太行民兵的角度,阐述了口述史的意义与局限,引起学者热议。

本次研讨会论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变迁等各个方面,讨论深入,不仅交流了最新成果,也拉开了史学界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序幕,必将推动抗日战争与大后方建设的研究。正如江沛在大会总结中指出的,本次提交的论文,涉及政治类的选题较多,尤以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为突出;而对于国统区国民政府政权建设的选题还有待加强,今后有关抗战时期大后方人物的研究可进一步深化,在研究内容上应该关注日伪及战争背景下的各个历史主体,方法上应注意视角的创新。

〔作者温艳,陕西理工学院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后〕

(责任编辑:马晓娟)